



中華最早
的佈道者

梁 啟 超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

中華最早
的佈道者

聖經

新約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最早
的佈道者

梁發

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郵費在外)

原著者

麥沾恩牧師

譯述者

胡簪雲先生

重譯者

上海廣學會編輯部

發出
行版
者兼

上海廣學會

代

印者

協興印刷公司

△ 版權所有 ▽

The First Chinese Protestant Evangelist

LEUNG FAAT

(Leung Afa)

1789 - 1855

By

Geo. H. McNeur

Published b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SHANGHAI

1931

Price: 25 cents per copy

自序

在嶺南大學的校園中央有一座墳墓——梁發的墳墓。雖然中外人士們現在只有很少數能明白這個人為什麼受了這麼隆重的紀念，然而他死的時候（一八五五年），梁發這個名字已洋溢於英美的教會了。這本小書就是解明梁發之所以值得有這麼敬重的理由。

在這美國首次的教士們抵粵一百年的紀念當中，這本小傳出現，可算是適合。由於馬禮遜，裨治文，和梁發所發軔的中華基督教會，來刊行這書，並且又是在於牠的全國總會第二屆常會之期而出版，更可以說是適合了。

梁發現在已經不止是屬於中國的教會，並且簡直是屬於全世界的教會了。所以在敬獻這本書於別個同樣的中國基督徒——誠靜怡博士——時，我們謹禱這個使徒生平的故事能帶領教會各肢體更能與主耶穌基督團結，於是又更能彼此互相團結。願這故事能助我們內心的火焰更熱烈地燃燒起來，正如梁發內心那種宣傳福音的火焰一樣。

一九三〇年十月，麥沾恩序於廣州白鶴洞協和神科大學。

梁發自序

一

重譯小言

在預備這書的時候，我們有麥沾恩先生的英文原本，和胡簪雲先生所譯的文言本梁發傳。麥先生要廣學會把這書重版，同人等當然很歡迎，不過現在的卻是變成白話了。

有許多地方仍舊用文言本的語氣和名詞，所以這書的出版不能把文言本的譯者胡簪雲先生之名抹煞。

重譯這書的時候，最費心力的是陳德明先生，其次就是杜少衡先生。我們不得不向他們表明感謝之意。

梁發先生的宗教生活是每一個基督徒應該看的，也是每一個基督徒應該效法的。這樣的信徒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啊！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謝頌羔附啟。

中華最早 的佈道者 梁發

第一章

穆德博士說：『我深信今日全世界的人——尤其是西方各國的人——應對於教會歷史下一番空前的研究功夫，廣義言之，就是應該對於歷來基督教在世界各處傳佈發展的史蹟加一番切實的研究。我誠心相信，在我們的宗教史中，今日可算是最困難的時代，我們須搜羅各時代的經驗，以爲我們今日的借鏡。……我深信研究那普及全球和繼續生長的基督教是極有益處的。』上面一段話是穆德博士在一九二六年的上海基督教大會中所說的。我做這本傳記，就是希望稍有助於穆德博士所提倡的那種研究工作。『繼續生長的基督教』的最高表現乃在於各地基督徒中有富於創造力的人，由他們用自己的生命來續成耶穌升天後所遺下的那部沒有寫完的使徒行傳（見使徒行傳一章一節）。

看了今日中華教會的巍然獨立，看了中華教會的責任心的迅速發長，看了中華教會在劇烈壓迫中的堅固不搖，我們就不能不『飲水思源』而聯想到那些奠此基礎使此名貴的建築得以成立的先進。我們現在用擴大的眼光來看過去的中國教會史，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改正教會之建立者早已在我們之前找到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中國人也是上帝的子女，上帝決不會不讓他們作他的見證人。孔教經典亦能引導人們趨向基督，這種經典幫助我們中國人用我們民族的特長來解釋基督的福音，正如柏拉圖無意中爲基督教在希臘化的羅馬世界中樹立了基礎一般。梁發先生早年奉佛教，本書中雖屢向佛教作嚴刻之批評，但梁發先生之早期信仰中實有數點爲其日後接受基督教真理的準備。回教徒和一部份的猶太移民曾與景教徒和天主教徒同向中國人證明一神的真理，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對於這個真理原已見到，可是所見甚爲隱約。景教在中國的遺跡除了西安府的石碑之外一定還有許多，雖或模糊暗昧，難以指實，然其必有，殆無可疑。數世紀以來，羅馬教會中人將十字架的福音傳佈於中國各地，雖然屢遭壓迫殘殺，却是百折不回，

終獲最後之勝利。

在改正教的先進中，馬禮遜先生自然永居首席。他那充滿靈感的生平久爲全世界基督徒所共知，但是他的華人同事梁發先生的生平則知者甚少。梁先生乃中國第一個改正教宣教士；當全國人反對基督教之時，他獨敢自承爲基督徒，從這點上就可看到他不是一個尋常的基督徒了。因爲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基督徒，所以我們都應當知道他的生平。還有一層關係，就是現在中國人的民族精神日見發達，大家都知重視本國的東西了，即以中華基督教會而論，它也開始注意其自己本身的歷史，在這個時候，我以爲拿一個中國基督徒先進的生平來研究一番，是最有價值的，何況那人的信仰是曾經經過長期的嚴酷試鍊而始終堅立不移的啊！

不幸得很，在有人想到爲梁發先生作傳的時候，所有認識梁發先生的人都已經不在人間了。關於他的工作的中文文件，可采用的很少，而他自己所著的佈道小叢書亦已失傳，因此，我們不得不賴英文文件來編出這位教會老前輩的傳記。十五年前，廣州河南

梁發

四

梁發先生的故宅中尙存梁發先生的文件和書籍一籃，但經一九一五年的水災以後，那些文件已經散失無存，幸而還留存了這大宣教士的一幅畫像和他所用的那部一八一三年在廣州地方出版的馬太福音。至於英文材料之可靠者，作者已經費了十餘年的光陰向各方盡力搜集，現已足供著作此書之用；但作者仍望讀者能賜以新的材料。

梁發以乾隆五十三年（即西曆一七八九年）生於廣東省廣州府西南約五十英里的高明縣。他出世時，馬禮遜先生年方七歲，正在英國紐喀斯爾（New Castle）地方入校讀書。一九二〇年，那有人口十萬的高明縣中祇有基督徒十人，從此可見西國佈道會和中華基督教會對於這中華第一使徒的興趣是並不十分濃厚。梁發的父母在三洲司古勞村居住，他們是貧苦的鄉人，大抵以農爲業，因爲家貧之故，他們等到他們的兒子到了十一歲才把他送到村塾裏面去念書。梁先生的童年生活已經無從稽考，我們祇能想像他那時或在山側牧牛，或在林中採薪，或在田間耕耘，或在陳設簡陋的家中操作而已。在這時期中，他的身上必定充滿着足以形成他的性格的影響與事實，以爲其日後奮鬥之準備。名哲

說：『生命之書沒有序言，每頁都是正文的一部份，祇要我們善於尋繹，則每頁中都可尋出重要的片段。』我們可以斷言，童年的環境與一個人的人格之構成有莫大的關係。

一個孩子到了十一歲方進村塾就學，那個孩子是必須要有些勇氣纔行；因為大多數的兒童都在較幼的時候就開始讀書了。塾中同年的學童程度自然都比他高；但是刻苦求學是中國人的特長，足以破除一切障礙。據說梁發最先讀三字經，然後讀四書五經，在村塾中讀了四年書之後，他對於中國古來豐富的典籍就有了相當的涉獵，而樹立了他一生工作上所不能缺少的文學基礎。他所受的儒家倫理教育，和關於忍耐，禮讓，勤苦，服從，克己等各方面的訓練，都在日後獲得豐富的收成。我們披閱梁發先生的日記及其致倫敦佈道會的信件，見其字體端麗，就不禁想起他童年時教導他的教師來（此日記及書信至今保存在倫敦佈道會內）。當時教育與宗教並不分離，在每晨未上課之前，學生必須在聖人神位和教師前面各作三揖。他日後篤信基督的那種深厚的宗教天性已於此時在宗教程度低淺的家庭，廟堂，和學堂的禮拜中逐漸發展了；正如保羅論律法時所說，

梁發

六

他們都是引他歸主的塾師。

古今偉人多出自貧苦之家，而上帝在他們童年之時已經在無形之中爲之預備一切，
梁發先生即其一例。他的名字是一個『發』字，『發』的意思是『差遣』，他正如施洗
約翰出世時已是『上帝所差遣之人』了。以賽亞書中所說『我以名呼爾，爾雖未識我，
我已稱爾名』的話可以移用於梁發先生的身上。名哲說：『一個基督徒的人格之構成，
似乎上帝在數世以前已經動手預備，爲之積累家風世德和所謂『世襲之恩典』，使時機
一至，可以在這充實的根基上迸出基督化的人格來。』

第二章

梁發自從離開學塾之後，即來省城自謀生計，由此可見他的家中是如何的窮困，而此人的自立精神是如何的發達了。我們現在閉目一想，可以想見一個少年將敝衣數件捲入被內（被外包以草蓆）而負之以赴渡的情形。這時他纔十五歲，心志尚未堅定，而竟離開父母，故鄉，和童年的伴侶，遠適異鄉，實非易事。當日同船的人自然猜想不到這小小的孩子是出發去樹立那改變吾華人生活的機關之基礎的。舟行一夜，翌晨便抵省城。

當船經過河南洲頭嘴之際，此童遙望省垣，開始與西方世界接觸，原來當時珠江沿岸，洋行櫛比，而洋行之前又有一座西洋式的花園。洋行的數目一共是十三家，其中十二家爲西國商人所設，其一則爲中國商人所設。過了西濠口，又有高房多所，其中居住中國洋貨商，他們負有監督外國商人行動之責。

那年是一八〇四年，正是馬禮遜上書倫敦佈道會請願來中國傳道的那年。馬禮遜的

請願書中有『求上帝將我置於困難最多和從人類眼光中看來最難成功之佈道區域中』的話；他的請願受了允准，而他就起程來華傳道，一手樹立中國改正教會的基礎。

梁發最初學造筆之業，旋即棄去，而改習雕板。他在一個業師之下繼續學習了四年，他的技術與年俱進。同時，他對於文學一道也致力研究，以爲日後從事著作之張本。

當梁發從事學業之際，馬禮遜先生來到中國，他於一八〇七年九月七日抵廣州。他來的時候，那些英國船舶都不願載他，因恐介紹傳道者來華將於他們的商業上發生阻礙，於是不得不至紐約去搭乘美國輪船。當時中國政府嚴禁基督教之傳入。他既爲他的本國人所棄，又爲中國人所反對與懷疑，更爲澳門的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所窘迫，但他仍堅信他是上帝遣來中國傳道的人。他在紐約的時候，有一個船主以譏諷之言問他道：『馬禮遜先生，你真以爲你能感動那些拜偶像的中國人麼？』他回言道：『不，先生，我以爲上帝能够感動他們。』他抱了這種信仰而開始他的工作。二年之後，東印度公司因爲他熟悉中國文學，聘之爲翻譯員。他欣然接受此職，因爲在該公司的保護之下，他

可以把聖經譯爲華文。

梁發之母死於一八一〇年；他被召回高明奔喪。他大概每逢清明和新年回家一次。他那時已脫離學徒生活而做了一個正式的工人。他所掙的錢很是有限，可是他時時寄錢到家中去。那時他已經是二十一歲，但是尚未娶妻，此事可以證明他的家況之貧困，因爲那時的中國人大都是早婚的。他歷年所積貯的一些錢在他的母喪中用去了大部份。喪事畢後，梁發重回省城作工。

回省以後不久，此青年雕板匠就因其手藝而與馬禮遜先生發生了接觸。在普通人的眼光中看來，這個會晤不過是偶然的，其實却是神旨所定的。梁發當時在離洋行區不遠的某印刷所中做工。一八一〇年九月，馬禮遜先生的聖經譯本已經達到可以付印的程度。他預備先印使徒行傳一千部。這本使徒行傳並非全是新譯，乃是改訂羅馬教教會中的一個譯本而成的。此書印刷由馬禮遜先生的華人助手蔡盧興先生經手。蔡盧興後來自己承認他承印此書取價比較平時印費多取二三百元，因爲那時他所承印的使徒行傳每部的

印刷費是五角錢，後來全部新約的印費也不過如此。但當時印刷工人承印聖經，乃是一種冒險的事情，所以多取幾個印費，以資彌補，在我們看來也是應當的。

此事經過之後不久，清廷就頒布禁止基督教的諭旨，裏面有話說：『自此以後，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教機關，希圖惑衆，及有滿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教，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爲防範，爲首者立斬；如有秘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教而不改稱名字（洗禮也）者，斬監候；信從洋教而不願反教者，充軍遠方。』當時政府壓迫基督徒如是之甚，無怪印刷工人非重酬不肯承印基督教書籍了。那次所印的使徒行傳，書面上用一條假書簽，以圖掩飾。我們深信那次多取馬禮遜先生印刷費的事情，梁發必不與份，否則，馬禮遜先生以後必不會再那樣信任他了。在這種危險的情形之下，他仍

敢幫助外人印聖經，這裏就可以看到他爲人之勇敢與富有自主精神。在一八一一和一八一二年的兩年中，馬禮遜先生把路加福音和新約書信之大半付印，而此等書籍之影刻及印刷多出自梁發之手。

一八一三年，馬禮遜先生的同志米憐先生夫婦來華，馬禮遜先生夫婦之岑寂因得稍解。米憐先生來時，亦如馬氏初來時一般，爲澳門地方的葡萄牙政府和廣州地方的當道所反對，不許他在中國居留；數月後，米憐遂離廣州而往南洋羣島，在那裏的華僑中間傳道。不久，他回到廣州去，獻議馬氏，邀他到馬六甲去設立傳道總機關。馬六甲與新加坡相去約一百英里，又鄰近那居住華僑甚多的東印度羣島，又爲中國與印度間交通之大路，氣候宜人，而那裏的英國政府又同情於基督教。

梁發常被誤認爲中國第一個信教的人，但是馬禮遜和米憐的來往函件中清清楚楚表明其不然。中國第一個信徒是蔡亞高，就是上面所說的蔡盧興之幼弟。當馬禮遜來華後第一年，亞高年方二十一歲，常到馬氏家中聽他講耶穌，但是因爲言語上的阻隔，不能明瞭所講的是什麼。後來亞高之兄僱他監督雕印新約的工程。馬禮遜先生華語進步之後，亞高遂常來馬氏家中聽經，聽得津津有味。一天，亞高拿偶像數具給馬氏看，他說已信耶穌，並且相信了宣教士所說崇拜偶像是無意識的那話。一八一二年九月八日，亞高

請求馬禮遜先生爲之施洗。亞高性情躁急，常與其兄及其同事口角，故馬禮遜先生以爲不如把他辭去。他的性情雖如此暴戾，但他每禮拜日必行數里的路到馬禮遜先生的家中去敍會，從不稍爽。他漸漸的養成了祈禱的習慣，而自覺對於親友等未盡其應盡之責，並自覺性情之不佳。因爲他似乎有真心悔改之意，而且他所寫的信仰志願書亦甚令馬禮遜先生滿意，馬禮遜先生就決意爲之施洗。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他在澳門海濱某小山山側的泉水中受洗。蔡亞高此後繼續嚴守他的信約，以至於死。他死於一八一九年。

有人說，蔡高後來被天主教徒誣告於香山縣官之前，控其妖言惑衆，縣官將他監禁起來，後來他就瘐斃獄中。但是馬禮遜的函件未曾說及此事。三年後（即一八二二年），其兄亞興也信了耶穌，且請馬禮遜爲之施洗；馬禮遜希望彼能真心信道，却並未爲他施洗。蔡高有弟名亞三，亦爲馬禮遜先生所僱用，他也相信福音。

當馬禮遜先生遣米憐先生往馬六甲設立福音堂時，曾以新約木版多組給他帶往，並僱印刷工人數名與之同行，梁發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人。在那時候，他竟肯漂洋過海，隨